



[第3卷]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2001

俄罗斯史

(英)杰弗里·霍斯金 著 李国庆 宫齐 周佩虹 郭燕青 译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俄罗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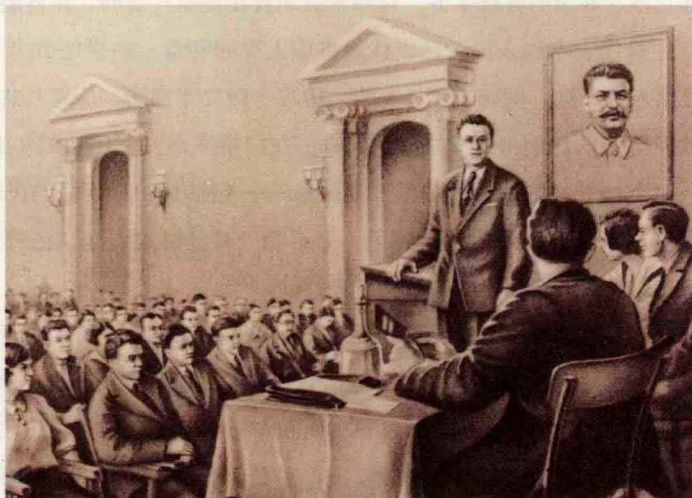
[第3卷]

(英)

杰弗里·霍斯金 (Geoffrey Hosking)
著

李国庆 宫 齐 周佩虹 郭燕青
译

社会变革及白色恐怖



1935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进行清党会议的情形。

多民族政权苏联

如果不去看苏维埃1923年的宪法，而只考虑影响这个新政权建立的其他因素，就会很清楚地看出俄罗斯在苏联的霸主地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土占苏联总面积的90%，人口占苏联总体的72%。共产党中央集权制日趋严重，1927年65%的党员为俄罗斯人。全苏联性的机构，如红军、契卡、最高人民经济委员会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均设立于莫斯科并由共产党领导。想要限制俄罗斯在苏联的支配性地位比登天还难。这样的政权组织形式或许符合列宁的要求，但实际上斯大林还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权力。

矛盾的是，俄罗斯民族自身状况也不尽如人意。在众多的联邦共和国中，只有俄

罗斯没有自己的首都，也没有自己的共产党组织。有位学者打了一个幽默而生动的比方：若将苏联的组织形式比喻成一套共用的公寓，那么每个联邦共和国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而俄罗斯却只占有过道、走廊、厨房和浴室，他们管理着这些地方，却挡了他人的道，而自己却没有单独的房间。在苏联体制下，俄罗斯向单一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的潜在可能性甚至远远比不上过去。民族目标与整体目标之间一直存在的对立冲突也日趋恶化。

此外，为了赢得当地民众在政治上的拥护，当局实行“本土化”政策，提拔了一些当地干部管理共和国的各级事务。这些人必须曾在莫斯科受训，而且能够在人民委员会及共产党里代表本族人民说话，代表本族人民的利益。20世纪20年代，当局鼓励当地居民加入共产党。例如，在乌克兰，1922—1932年期间，乌克兰共产党员在当地的苏联共产党中的比例由24%增加到59%；在白俄罗斯，比例从21%上升到60%。就这样，政府当局有目的地赋予非俄罗斯民族——包括其中最落后的民族——获得公民身份的基本条件，并为他们创建了一个有朝一日能够建立起自己民族国家的框架，而这一切都是在旧沙俄帝国的版图下进行的。

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这些举措的成效。20世纪30年代开始涌现出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当时用当地语言教授基础教育已开展了大约十个年头，这意味着大量涌进城镇的人在本族语言和文化方面都已受过一定的教育。20世纪30—50年代，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乌克兰移民更倾向于将这些城镇乌克兰化而不是被主流的俄罗斯文化所同化。由此，乌克兰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如此广泛的城镇基础。同样，向来由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统治的第比利斯也第一次成为以格鲁吉亚文化为主流的城市，而巴库则成为名副其实的阿塞拜疆城市。

由于在这场迅速的社会变革中，当局并没有尝试建立起公民社会的相关机制，因此这场社会变革在一些地区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即以血缘关系或宗族结构的形式巩固并强化了传统权威。此后，“党任命干部的制度”便为这种机制提供了垄断性的框架，使国家成为其后盾，因此使它们比以前更为顽固。这一举措在普遍以血缘关系为庇护基础的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效果尤为明显。例如，在哈萨克斯坦，定居的游牧民族发展成为苏维埃后，仍由部落首领统治，同时，它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但也常遭受其更多的干涉。

无论是身为苏联人民委员还是之后成为党的总书记，斯大林一直强调地区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民族，不分大小，都能以“自治”共和国、地区甚至行政区的形式得到自己独立的地域的原因。这项政策也适用于那些长久以来都没有家园的犹太人，他们分得了与中国接壤的比罗比詹自治区，可是很少有犹太人真

正在那里定居下来。此外，即便其他民族人口超过了当地的“核心”民族人口，这些地区的行政单位仍以该“核心”民族命名。因此，在摩尔达维亚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人口约占当地总人口的60%；在卡累利阿和布里亚特地区，俄罗斯人口所占比例也超过了一半。

除区域自治外，还有一种便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独立的文化自治。但这种文化自治放在苏联就意味着独立的公民权利，苏共对此一直抱有疑虑而未予采用。与此同时，苏联着手开展了一项所谓的“民族工程”，即在可用的民族资源中发掘新的民族。为此，人种研究者被派往各个地区收集包括语言、宗教、风俗、经济、部落忠诚度及其他方面的相关资料，并为如何就现有资源创造出新的民族出谋献策。

语言是一个关键因素。为了将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纳入他们的宣传网络和政治教育中来，苏维埃政府必须保证这些人掌握一种书面语言；有时甚至必须为他们创造出一种书面语，或至少从现有的方言中选取一种作为他们的语言，继而便要确保这种书面语在扫盲、大众传媒及教育系统中被广泛使用。当地语言的广泛使用引起了俄罗斯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让他们孩子去学“乡下话”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而他们自己必须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这种语言简直是一种屈辱。不管怎样，到20世纪20年代末，官方已确定了192种语言，其中大部分必须配上相应的语法和字典才能使用。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建构只是一个暂时性阶段。尽管如此，实际情况却是：苏联所构建的民族结构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能反映民族融合团结的现实。当民族建构不再是暂时性的，苏联20世纪20年代所进行的这些举措也便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意义。

1932年苏联引进内部通行证，使这种反常现象进一步加剧。每一份身份证明文件上都有一项“第五条”：民族。这意味着每个苏维埃公民都有特定的民族身份——事实上是固定的民族身份，因为修改“第五条”是不可能的。只有年满16岁的公民在申请第一份通行证时才有选择自己的民族——并且只有在父母来自不同民族的情况下他们才有这种选择权。

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民族便成为一个比“社会出身”更为重要的身份标记，在人事政策中也出现民族歧视现象及相关的暗箱操作。苏维埃1936年宪法颁布，“旧有的”社会阶级可重新获得包括投票权在内的完整的公民权。在公众的谴责和控诉声中，“阶级敌人”的称号逐渐被不分阶级、不分民族的“人民的敌人”一词所取代。总的来说，尽管各地情况不同，但联邦共和国及大部分自治共和国在教育、住房及就业等方面仍偏向于当地民族，到20世纪50年代，政策也向斯拉夫人倾

斜。因此，各个共和国都成为代表本民族人民的大本营，尽管“社会阶级”一项直至1974年才从通行证里被删去。

然而非俄罗斯公民并不能自主决定所有事宜。虽然政府鼓励当地人担任共和国干部，但所有有关这些干部的任命及撤职的重要决策都是在莫斯科决定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路线。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只是要符合苏联整体的利益，而不是以满足当地人民的需求为主。1928年起，苏联开始实施五年计划，越来越多的经济命脉开始受到莫斯科的直接掌控。

此外，地方语言和地方文化得以发展和创新，但它们都被置于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主体框架内，俄罗斯的语言、文化、帝国价值观越来越专制地强加给各地区，成为它们必须接受的东西。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在1945年以后，历代沙皇不再是受人唾弃的剥削者，而被颂扬为预见了苏维埃联盟大国的创造者和支持者。从1938年开始，无论当地的母语是什么，全国所有的学校每星期至少要教授4个小时的俄语。在20世纪30年代，除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外，俄语成为其他所有地区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学语言；同样，除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及阿塞拜疆语外，其他所有的联邦国家语言必须使用西里尔字母，这一措施断绝了人们接触历史书面文化的机会。俄语成为红军唯一的军用语言。而到1938年，所有的非俄罗斯军队全部被解散，此后军队又不得不征募各民族士兵，这些措施并不是简单地从上面强制压下来的。



1930年斯大林与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斯大林一手打造了以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力量及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为特色的民族主义。

一些踌躇满志的非俄罗斯人认为，一口流利的俄语能够让他们在苏联的任何一个地方找到工作，进而帮助他们飞黄腾达。

斯大林将这一喜人的成果视为国际主义的胜利，大多数人则把它看作是“俄国化”，但第二种观点显然太过简单。在20世纪30年代，部分俄罗斯民族身份的支柱，如农村公社、东正教以及许多俄罗斯最为宝贵的文学与文化等，同样也遭到破坏或镇压。如果斯大林推行的是俄国化，那么这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新俄罗斯主义的俄国化，它蔑视俄罗斯民族文化，并危及俄罗斯文化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对斯大林来说，俄罗斯人只是建立社会主义帝国的原材料，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对他来讲有价值也只是因为这些能被用来维持这个帝国，比如说促进非俄罗斯民族的同化并使他们成为帝国的一分子。至少从目前来看，“国际”并不代表着全世界，而仅仅指代多民族的苏维埃联邦，而在这个联盟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则是同类人中的领头人。

斯大林一手打造出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可以说是自成一类，并不为多数1917年前的俄国民族主义者所认同。它属于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民族主义，以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力量及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为特色。然而，它还保持着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影子，如果失去了这一点，新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就失去了支撑及号召人民臣服于它的力量。苏联人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伟大帝国的战争”，而士兵们却喊着“为了斯大林！为了祖国！”的口号奔赴前线。他们口中所指的“祖国”是指祖国或家乡，即父母或家庭居住的地方，也是俄罗斯最杰出的战争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所歌颂的地方。事实上，这两者密不可分：祖国激励着俄罗斯人奋起作战，但它不能脱离国家或帝国的军事、工业力量而存在。这便是“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实质。

总的来说，到20世纪30年代末，出现了一些相互矛盾的情况。非俄罗斯民族拥有了自己的领土、语言、文化及行政体系；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政党、国家经济计划及过热的社会向上流动趋势日益削弱了各民族的独特性，形成了一种统一的苏维埃—俄罗斯风貌。从本质上来说，非俄罗斯民族得到了认同，但却没有获得独立的主权——这形成了随时可被点燃的导火线。

革命文化与“新人类”

列宁的启示性政治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革命爆发前的最后二十年，宗教和文化折中主义层出不穷，部分原因在于东正教的衰败。宗教和文化的折中富有创造性却难

以驾驭，几乎每个想要被认真对待的人都必须宣扬自己的启示方式——如果不是宣扬革命方式的话。

俄罗斯文化已经脱离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乍一看貌似是对象征主义者所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新主张，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象征主义者所宣扬的并非艺术的自主性，而是一个更有野心的主题，那就是在对现实更为新颖深刻的洞察基础上改变生活。他们不赞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头脑简单”的认识论，坚称人们所感知的物质现实只是通往更深一层精神现实的渠道，而艺术家们的作用则在于透过物质现实感知心灵的真实。这不仅是一种艺术上的尝试，也是一种宗教启示行为。弗拉基米尔·索罗维耶夫的观点是许多象征主义作品的基石，他认为艺术应达到天地和谐，并促成现实的最终转变。杰出的象征主义者安德烈·别雷宣称“艺术即创造生活”，并认为“创造性最终会直接转化为宗教的创造性，即仙术”。在他看来，革命便是这个转化过程中的一部分，是悲剧性的、充满矛盾的，却又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就像一把双刃剑”，他写道：“它充满暴力，却又蕴含着自由。它代表着旧事物的灭亡，也代表着新事物的诞生。”象征主义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这种观点出发诠释了俄国革命，称其为一场从大草原袭来的锡西厄人入侵，目的在于摧毁并清理俄国旧社会，从而以同样的方式创建欧洲文明。在他最后一首诗作《十二个》¹中，他将彼得格勒的红卫兵描绘成基督耶稣领导下的信徒。

作为后起之秀的未来主义者喜欢嘲笑象征主义派的“神秘论”，但他们的观点在本质上与象征主义派一致，即旧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最终的危机，这场危机将导致剧烈的社会变革，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类将从中诞生。未来主义者中最出名的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年轻时曾是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是一股净化的力量。未来主义派沉浸在充斥着技术、体育及大众传媒的现代城市生活里，叫嚣着“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从“现代主义的船上”扔下去，并主张要用那些从丰富的城市生活中提取的新词来更新文学语言。这样，艺术将使生活获得新生，并使“新人类”的创造成为可能。

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许多方面都承袭了这一主张，文化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它过去对沙皇而言的重要性。赋予



《诗人勃洛克肖像》

亚历山大·勃洛克
(1880—1921)，20世纪早期俄罗斯诗人、剧作家，代表作《十二个》。俄罗斯“艺术世界”画派画家索莫夫(1869—1939)绘。

1 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代表作，发表于1918年，是一部描述1917年革命期间圣彼得堡街面上混乱景象的史诗作品。



苏联体育

1927年，莫斯科红场上的运动员。

俄国革命动力和苏维埃政府权威的是一种创造“新人类”的理念，“新人类”之间的相处比阶级斗争和劳力分工社会里的人际关系更为和谐。“新人类”多才多艺，且更具社会意识；他们掌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正确的社会进化理论；这些“新苏联人”将能改造自然，并使它更好地符合人类的需求。托洛茨基宣称：“‘新苏联人’会指出哪里是天堑，哪里又是通途；他们将为河流改变航向，为海洋订立章法。”同时，“新苏联人”会把创新能力与大师的杰出品质结合起来，“人类将变得无比强壮、智慧而敏锐；他的身躯将更为协调，行动更有节奏，声音更为悦耳……普通人都能成为像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这样的伟人，并且继续达到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

关于这种极富创造力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共产主义思想家有有着不同的见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那将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每个人都愿意让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并以此来提升自我。中央劳工机构的主管阿列克谢·捷斯提夫甚至看得更远，他大胆地指出未来的人类将会被机械社会所同化，都具有“钢筋铁骨”般的意志和体魄：无产阶级心理方面的这种机械化模式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会使人类成为丧失个性特征的个体。“人们只是被编号为A、B、C或1、2、3、4、5、6的个体，没有灵魂，没有个性、情感或是激情，人们不再用尖叫或是大笑抒发自身情感，而仅仅通过速率计或压力计上的数值表达一切。”

捷斯提夫领导的中央劳工机构最早开展“劳动力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工业生产过程可被分割到最小的单位，人类可被分配到这些细化的工序里，这样，只要掌握一些简单易学的手势和动作，他们就能创造出高水平的生产力。这种模式，尤其是在底特律的福特T模式汽车工厂所运用的泰勒工作体制¹，激起了列宁的热情，他希望借助这样的模式在落后且教育水平低下的俄国提高生产力。

重铸文化的第一次尝试始于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协会，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也于1917年相继开展了文化重铸工作。这项工作的理论家亚历山大·波丹诺夫认为，工人阶级将真正创造出一种与旧贵族、资产阶级世界的文化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新文化，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集体主义制度，他们所从事的机械化生产必将激起他们新的觉悟，而艺术作为“组织活动的最高且最难理解的形式”，将在社会变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波丹诺夫提出的富有创新性的“组织科学”或“组织形态学”，把艺术、科学及所有知识领域都统一整合到一个最高的无产阶级综合体之中。

1917年，单是在彼得格勒，就有约150个工人文化教育圈，拥有100,000名会员，主要由工厂委员会负责组织活动，包括唱诗班、歌舞剧团、戏剧俱乐部、自我教育社、政治研究组及宣传活动中心。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一样，他们对临时政府渐生疑虑。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们仍然保持高度自力更生的独立性，并与苏联政府及共产党刻意保持距离。在之后几年的社会动荡中，他们成为也许是人数最多、最为独立，同时也最具激情的群众团体。地方性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协会的会员多为年轻人，迫切地渴望学习并尝试新事物。

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工人们从来没有像这样与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在如此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相互交流：著名的文化界名人，如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制片人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家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和安德烈·别雷纷纷到场召开研讨交流会。从该组织所发行的刊物名称上——如《未来的黎明》《钢铁救星》《机械天堂》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协会极富创新性的特色所在。一位无产阶级诗人号召他的同伴们“发挥你们的才智和力量……这样，俄国的复兴才能散播到全世界”。协会主席帕维尔·列别捷夫·波利安斯基则预言，“一种新的科学、艺术、文学及道德，即工业无产阶级所孕育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将为新人类调制出一套情感和信仰的新体系。”该协会采用“生产艺术”，结束了“资产阶级”长久以来使艺术与工业相脱离的状况，并利用工业技术使艺术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1 由弗雷德里克·泰勒在20世纪初创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工作定额、实施标准化管理、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和主张职能工长制等。



《国际歌》

《国际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20世纪20年代曾成为苏联的国歌。

话剧逐一展现了历史上的众多重大革命时刻，自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到1905年夭折的俄国革命等，并将这一切融入新政权表演者的演讲词中。最后，一颗红星出现在东方，人民群众推翻了剥削者，蜂拥到金色大门旁，迎来了期盼中的理想国度。最后一幕，演员们围着自由之树载歌载舞，河船上的探照灯照亮了整个舞台，乐队奏响了《国际歌》，伴随着工厂的警笛声，整座城市沉浸在震耳欲聋的大合唱当中。

当然，这样的场景绝非即兴演出，而是由彼得格勒顶尖的话剧导演精心策划安排的。尽管如此，与其他革命后建立的组织相比，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协会不仅代表了劳动人民追求自我提升的自发愿望，也暗示了一种潜在的、日趋普遍的救赎主义。作为一个组织，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协会始终不能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不清楚它自身的存在到底是为了向工人宣扬旧文化的基础还是要大胆尝试创造新文化。此外，尽管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协会对政府当局持对抗态度，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补贴。1920年至1921年的冬天，政府中止了对它的补助。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协会必须严格服从人民教育委员会^{II}及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因此，协会的大多数教育宣传职能移交到了共产党的宣传鼓动部门，或是移交到人民启蒙委员会下设的由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主管的政治教育部。

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协会丧失了独立权，也就日渐失去了热情，尝试创立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并努力促成以群众为基础的乌托邦式计划也就随之搁浅了。重要的革

II 负责公共教育事务的管理，1946年更名为教育部。

命动力来源就此丧失。之后数十年里，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或其他类似组织里的所谓无产阶级作家，要么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要么缺乏创新性：他们的写作技巧只是参照19世纪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的手法而已。

尽管如此，艺术家们仍不遗余力地试图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壁垒，并将艺术与工业结合起来。1921年3月成立的建构主义第一工作小组宣称，艺术家们必须“到工厂里去，因为那里才是真正锻造生命之体的地方”，这样才能“实现物质结构的共产主义化”。莫斯科苏维埃的视觉艺术部门任命弗拉基米尔·塔特林建造一座革命纪念碑，这与列宁的纪念碑宣传计划相吻合。该计划意在通过一座座反映建设中的社会新风貌的建筑和雕塑，开展一项面向工人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塔特林的作品由此成为苏联早期现代主义、乌托邦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体。

1920年，革命纪念碑的模型在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展出，成为第三国际纪念碑（第三国际指当时还在筹划中的第三国际组织，而非之前的第三国际运动）。模型展出的同时，列宁在会上发表了全国电气化计划的演讲。根据设计，该纪念碑将横跨涅瓦河，由三个巨大的玻璃形状组成，主体依托钢铁支柱与螺旋，自下而上围绕着倾斜的中轴向上伸展，其高度将远远超过埃菲尔铁塔。最底端的玻璃形状为一立方体，将被用作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会场，每年旋转一周；中间的一个则呈金字塔形，每月旋转一周，其中设有行政办公室；位于最顶端的玻璃形状则为一圆柱体，每天旋转一周，是信息与宣传中心。这座纪念碑将艺术性与实用性结合起来，完美地体现了“生产艺术”的精神。塔特林本人曾说：“钢铁正如无产阶级的信念一样坚定，玻璃正如无产阶级的意识一样明净。”

然而重要的是，这座纪念碑并没有被真正建立起来。也许是因为从工程学的角度看，它的设计并不符合实际，而更有可能是因为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里，曾促使人们建立这座丰碑的救世精神已经在毫无建树的社会环境下消失殆尽。

在戏剧界，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领导了另一场运动，试图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壁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用脚光灯和幕布将演员与观众隔离开来，而梅耶荷德想要摆脱这种模式，将一些从未被相提并论的生活和艺术元素融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剧院就像是马戏场和集市上的货摊，戏剧不仅有口头上的慷慨陈词，也融合着木偶戏、流浪艺人、即兴喜剧、音乐和舞蹈。他还创造出一种名为“生物力学”的人体韵律运动，以增强身体的协调度并达到戏剧的效果。梅耶荷德并不鼓励观众“消除疑虑”，相反他故意“撕下面具”，让观众注意到戏剧表演中的人为因素。

尽管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梅耶荷德与捷斯提夫仍有一些共通之处，即希望

消除一切旧禁忌，打破戏剧与生活之间及理论、美学与生产之间的旧壁垒，从而开创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的灵感并非主要来自共产党，而是源于革命前后笃信太平盛世、反对崇拜偶像的知识分子思潮。

东正教

十月革命之时，俄罗斯东正教也经历了两百年来最重要的历史变革。即使在莫斯科炮火连天之时，地方公会仍在克里姆林宫里召开长时间会议，决议恢复已经被废除了两百年的主教长制度。会议还讨论了教会应该如何在这个脱离了沙皇统治的新政体里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他们为此争辩不休，游戏规则却又一次地突然改变了：新政权建立，无神论者掌权，一心要破坏并彻底根除一切有神论思想。1918年1月，苏维埃政府通过一项决议，并将其委婉地命名为《论政教分离》。20世纪20年代其他法律的制定进一步补充了该决议的内容。这些举措无偿没收了所有教会的土地和资产，并剥夺了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任何由20名以上正式注册的成年信徒所组成的团体，都可以在保证建筑物完好的前提下免费租用教堂做礼拜，他们还可以雇佣神职人员主持礼拜活动，但包括宗教性教育在内的其他宗教活动都被明令禁止。牧师不再是信徒的精神导师，而只是一名雇员。慈善活动、公众游行、祈祷大会、圣经研习，甚至教堂敲钟都不再被允许进行。除了每周的礼拜外，信徒几乎不能合法地参与任何其他活动。由此，宗教在精神层面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都被严重削弱。

新主教吉洪对新政权最初颁布的政令表示强烈的不满，谴责并诅咒无神论者及那些以暴力伤害无辜的人。尽管他并没有号召信徒武力反抗苏维埃政权，但内战期间，牧师仍被当作敌人一般对待。到1921年，已有很多牧师被抓起来关进集中营，甚至遭到杀害，同时有近600间修道院被关闭。教会不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而吉洪也无法继续他的“和平反抗”。一些白区（白卫兵控制区）或国外的神职人员宣称要用武力反抗无神论者的政权。1921年，在南斯拉夫的卡洛夫斯，临时的移民教堂理事会号召信徒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君主制。

大动荡中教会的内部分歧给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契机：他们把东正教描绘成敌人，试图分裂并控制教会，同时还鼓动俄罗斯教会内部的宗派分裂。因1905—1907年的教会改革问题，教会内部一直存在着分歧，分裂问题也更加严重。革新派想要将主教



伏尔加盆地地区的大饥荒

1921年，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萨马拉遭受饥荒的人们。



东正教教堂被当作储粮仓

1922年俄国内战结束后，苏联布尔什维克掀起了集体反宗教运动。

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旧时的“契卡”）派出大批激进分子没收教会资产，对此一些教区展开了激烈的抵抗。一些神职人员因主张保护教会资产而遭到了逮捕，还有一些被处决，其中包括彼得格勒的都主教韦尼亚明。吉洪被软禁起来，两位革新派牧师——亚历山大·维坚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克拉辛斯基探望并劝说吉洪道，如果他自己再这样继续下去，今后将无法行使任何职权。他们成立了高等教会管理处，由革新派主教安东宁担任主管，并宣称这一切都是吉洪授意的。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协助下，教会管理处逐步控制了各个教区并向它们派驻自己的牧师，同时也开始实行他们计划已久的改革。

之位让与白人牧师，并希望以现代俄罗斯人做礼拜的方式改革礼拜仪式。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活力教会”的组织，一方面宣扬自己所主张的改革，另一方面与政府修好关系，其中还有人提倡将共产主义视作基督教义的现代化形式。

1921—1922年间伏尔加盆地地区的大饥荒使当局找到了一个向教会施压的借口，并进一步深化了教会内部的分裂。吉洪急切地希望教会利用剩下仅有的、在做礼拜时不会被用到的贵重物品筹集资金赈灾，但坚持教会必须享有对物资分配的管理权。然而，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却要求国家控制物资分配权，并与托洛茨基口中的“黑百人组”决裂，召集新的委员会，选举新的统治集团。

教会的混乱意味着权力中心开始向各个教区转移。两百多年来，这些教区第一次享有这种自由决策权。比方说，它们可以自己挑选牧师。但在基层，革新派的改革进展得并不是那么顺利。他们的改革没有得到多少信徒的支持，尤其是在农村。就表面上来看，让人们疑虑重重的仅仅是一个微小的改革变动，即格列高利历（即阳历，吉洪本人也赞同使用该历法）的采用。村民们担心新历法的使用会打乱他们庆祝节日，从而无疑亵渎了某些神灵。教区的牧师也警告说，这样的改革很可能会使所有信徒背弃东正教而成为旧礼仪派的教徒。

最后，迫于民众的反对，当局放弃了对革新派的承诺，并同意释放吉洪，条件是他必须发布一份与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声明。1925年3月声明发表后不久，吉洪就去世了。共产党不允许教会推举吉洪的继承人，临时代理塞尔吉主教却发表了一份更具安抚性的声明，声明中说道：“我们希望成为东正教的信徒，同时也承认苏联是我们的家园。苏联的喜悦与成功就是我们的喜悦与成功；苏联的挫折与失败就是我们的挫折与失败。任何针对苏联的敌对行为……也就是针对我们的敌对行为。”教会精心措辞，在声明中使用了“家园”一词，而非“国家”，但这并没能阻止教会内部的进一步反抗，对于教会如此小心翼翼地拥护苏维埃事业的举措，教士和信徒们都表示无法接受。

20世纪20年代的中后期，当局主要通过宣传无神论并开展世俗的反正统文化运动来向教会发起挑战。1925年，“无神论者联盟”（1929年起更名为“激进的无神论者”）成立，拥有自己的杂志、大报及宣传材料。他们认为无神论的宣传者应该接受特别的训练，因为只有较好地了解礼拜、教义及各种教理知识，才能更好地驳斥信徒的观点。他们意图将教会描绘成一个实施剥削压迫的组织，用虚假承诺欺骗大众，以神职服务勒索钱财。如果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将开放阅读室和“红角”，支持扫盲运动，鼓励问题的探讨与辩论，从而将世俗的、科学的世界观的优越性更清楚地展示在民众面前。

对于当局的这些举措，民众褒贬不一，特别是在小城镇和乡村。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曾在工厂里工作过或是参过军的年轻人，或一心想脱离父权制家族自立门户的年轻人，往往倾向于支持无神论运动。但总的来说，人们还是持反对或猜疑态度。而无神论者也因为自身的拙劣性或缺乏训练，不能在社会上形成大气候。他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就是信徒或牧师，因此仍然使用旧时的宗教形式。有时，一些宗教组织自己成立了合作社或集体农庄，堂区俗人委员甚至牧师都有参加。

最终，当局试图逐步确定一种无神论反正统文化的尝试，还是在这场自上而下

发起的社会巨变中夭折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造的新工业区和住宅区大多没有修建宗教建筑，因此没有给人们提供宗教信仰的选择余地，而在农村，农业集体化往往意味着关闭教堂并逮捕牧师。激进分子来到教堂，卸下大钟用来充当所需的有色金属材料，强夺圣像和器皿，封锁教会大楼，并准备将其改为民用，比如改造成阅览室、电影院甚至集体农庄的商店。到1939年和1940年，最多只有500间堂区教堂仍在开放，这只约占革命前教堂总数的1%。此外，只有4名教区主教仍为东正教牧首全职主持事务，其他更多的都属于革新派和反塞尔吉教派。据估计，20世纪30年代，约有25,000到30,000名神职人员被捕，其中许多人最后遭到杀害。



残酷的反宗教运动

宗教改革中，修道院的壁画和浮雕被捣毁。

即便是30年代大迫害以前，俄罗斯民众中的东正教文化就只依赖于传统、社区及代代传承的学识，而不是依靠学习、《圣经》研读或是自身主动的信奉。共产党上台掌权之时正是文化根基开始改变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受圣典熏陶开始信奉宗教，但席卷而来的社会改革及无神论运动取缔了经书的传阅，根除了社区的基础，破坏了传统的传承，由此损坏了宗教信仰的三大基石。结果，大多数人逐渐失去了宗教信仰，对宗教日趋迷茫或淡漠，但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宗教信仰反而变得更为坚定且极度保守，只能是私下独自秘密进行，或是与其他为数不多的信徒共同进行。相比之下，妇女更加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因为她们中很少有人具有社会职业。

宗教改革进程最终遭到了革新派的破坏，部分原因是因为革新派与警察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但主要原因在于改革不可能在这种矛盾的环境中繁茂生长：一方面是对改革的漠不关心，而另一方面则是顽固的传统主义势力。神职人员，尤其是主教，因为他们对政权做出了贡献，或至少因为他们对宗教失去了热忱，基本上都成了国家等级任命制中的成员。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部分是因为教会的职能只限于每周举行一次的礼拜仪式，因此教会的神职完全只能流于一种形式了。

新经济政策

在共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当局不仅镇压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叛乱，同时也加强了党纪，逐渐放宽了经济政策。从意识形态上看，很少有共产党员赞同这种宽松的经济模式，但考虑到紧缩经济和国家垄断计划的失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政策转变是必要的。当时的工业产值仅为1913年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而钢铁产量仅为1913年产量的5%。由于粮食短缺及失业问题，城镇都处于半荒废状态，工人总数不到1913年的一半。除军用运输线外，铁路运输几乎全部停顿。从整体上看，农业遭受的损失较少，但多年来耕地一直没有得到合理利用，牧群缺乏足够的饲料，马匹则被政府征用。田里种的庄稼很少能够运送到城镇，人们只能从“行商”那里获得一点粮食。所谓行商，是指那些背着麻袋，一路逃避关卡，把粮食运进城镇，在搭建的集市上漫天要价的农民们。

无论如何，生产和贸易都必须得以复兴并使其福利惠及百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某些方面恢复市场经济，这便是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余粮征集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税收制。与不久前政府苛刻地掠取粮食相比，税收制不仅数额较低而且可以预见，农民又可以雇佣劳力和租种土地了。同时，个体零售贸易开始合法化，物资定量供应制取消。农民又恢复了提高粮食产量的激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在市场上以合理的价钱出售余粮，这样就可以利用这些收益购买其他物品了。政府还废除了零售贸易及消费品生产方面的国家垄断。为了保证人们有钱购买商品，国家银行重新开放，并于1922年11月经政府授权发行新卢布。新卢布以黄金和国家预算平衡为支撑，与纸币一起流通。这一切都预示着货币市场与股票交易市场的复苏。

这些举措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物质资料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尽管这样的成效并不合所有共产党员的意。一名来访的外国社会党人爱玛·戈尔德曼后来回忆说：“一夜之间，商铺林立，神奇地堆满了各种俄罗斯人多年没见过的美味。商店出售大量的牛油、芝士和肉类……苍白消瘦的男女老少驻足在商店橱窗，饥渴地注视着店里的物品，并讨论着这个伟大的奇迹：昨天还被认为可憎的东西，今天却以一种公开且合法的形式华丽地展现在他们面前。”定期的街市又再次出现了，破烂的摊子上摆满了行商的货品，他们再也不会被挡在城外了。多种形式的小企业繁荣发展：到了晚上，在明亮的灯光和诱人的香气中，咖啡店又开始了夜间营业，党员深恶痛绝的妓院也再